



# 识别与传承：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 建构中的中华文化基因

□赵哲

作为世界级城市群,系连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脉络依靠的是共同的中华文化基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建构,也应当重视中华文化基因的凝聚作用。作为中华文化内部最小的信息单元和信息链路,中华文化基因以连续性和稳定性表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以“日用而不觉”的方式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共有的中华文化基因不仅为湾区人民增强认同感提供精神动力,也为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建构的必然性找到了内在依据。

##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文化基因识别与传承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首次于2017年12月21日在深圳举行的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上提出。大湾区文学共同体构想的提出不仅有助于丰富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生态,更重要的是,还将与大湾区整体建设肩负共同的使命——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大湾区城市群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核心引擎,引领周边九座城市协同发展。因此,建构大湾区文学共同体也应以核心城市的文学特性为着力点,遵循“以点带面”的规律,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发展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互动交流的重要交汇点做好准备。

香港和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既重要又特殊,港澳两地的原生文化与大湾区其他城市无异,都是岭南地方文化的承载者,流淌着中国东南沿海特质的文化血脉,这种浓厚的地域文化基因深埋于城市的肌理,纵深而绵长。然而因历史的偶然命中,港澳两地“被选择”改写了命运,异质文化由此注入了原本单一而内向的文化传承模式,并逐步形成了开放而混杂的次生文化。虽然历史的选择一度让港澳两地失去了国籍,但百年间与祖国的往来从未间断,香港和澳门不仅作为内地与海外相当重要的资讯交汇处,还在文化群体“南下”与“北上”的往来中始终扮演着“第三空间”的角色。纵然开放而混杂的次生文化为文化基因的识别带来一定难度,几千年来中华文化基因却始终植根于港澳同胞的血脉中,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基因一脉相承,从未断裂,由此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建构奠定了十分深厚的文化和情感基础。

## 在“有序”及“失序”之间

若仅从香港、澳门的语言文字、风俗礼仪、地

方建筑等一系列外显的文化层面来看,中华文化基因在港澳地区的传承从未间断,这些“外显的”文化标识甚至较之内地的其他城市保存得更加完好;而一旦触及到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身份认同和审美倾向等更加“内隐的”文化层面,这种差异就变得难以准确表述。

以香港为例,这座历来被视为拥有较强秩序感的城市往往予人“文明有序”的印象,以往香港也的确在诸多方面表现出了应有的秩序感。然而在城市发展进程中香港“跳过”了一些必要的步骤,引发了城市运转过程中某些方面的失衡。如果单纯从文化的外显层面去考察,确实不易察觉,而一旦真正深入到香港文化的内隐层次,“有序”一词还能否继续为当下的香港文化特征而代言呢?其实这种潜藏于内的“失序”,不仅是香港市民对身份认同的困惑、焦虑甚至是逃避的外在体现,也是以香港市民为典型的现代人丧失精神依托从而盲目追逐物质成就的主要成因。虽然较为内隐,但纵观当代香港文学短短的几十年历史,不难发现其中对城市去向的密切关注以及对身份认同的困惑始终贯穿。20世纪70年代,西西在小说《我城》中发明了“城籍”和“国籍”的相对论;进入80年代,香港本土作家们自觉展开了对香港回归的大讨论,其中刘以鬯的《一九九七》、陈冠中的

《什么都没有发生》、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寂寞云团》)、李碧华的《胭脂扣》、黄碧云的《失城》、陶然的《天平》、梁锡华的《头上一片云》、陈浩泉的《香港九七》、叶婉娜的《长廊》以及白洛的《福地》等一系列小说,虽然各怀迥异心态,所依不同立场,但却一致表达了对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极度关切。除了小说以外,诗歌、散文和剧作等不同文体也都陆续涌入到这类主题的创作潮流中。这些作品反映出来的已经不是个别香港人的偶然情绪,而是面向内隐文化层次全面而持续的失序。香港总是因外在的物质成就而备受瞩目,必然导致香港人缺乏对内在精神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应有关注,于是当重大历史事件来临,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精神空间时,自然会在短时间内积聚各种复杂情绪,焦虑与迷惘不乏其中,而最终这种内隐的“失序”状态在香港文学场域中被充分地表达出来。

对于香港来说,精神内蕴的隐性缺失与物质成就的显性遮蔽之间犹如一道难以逾越的巨大裂隙,导致被秩序井然的外在环境所所长久掩盖的“精神痛”逐渐浮现,为该地区失序状态随时升级埋下了隐患。虽然历史造就的这种群体性的内在“失序”无法避免,但值此背景所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

文学共同体的构想,正是以共同的中华文化基因作为文化内隐层面的内驱力来弥平这种“精神痛”的适时之举。

##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构想与实现

粤港澳大湾区共同体本身具有相对完整的地域空间,有相对稳定数量的人口,有相对完善的设施,也具备独有的文化与地域认同感,逐一符合“言语共同体(社区)”五要素,可以被看作一个完整的言语共同体。社会语言学家普遍认为,语言是言语共同体内部进行沟通、形成认同的工具,同时也是言语互动与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该结果有助于言语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增进彼此更深层次的情感认同。故由粤方言认同与粤方言书写意义的追认路径出发,最终实现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建构的愿景具有较为可行的理论依据,粤方言与藉此产生的认同感遂成为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重要维度。

一部分广东籍作家,尤其是当代香港作家热衷于粤方言作品的书写与保护,他们或以粤方言进行纯口语化的写作实验,或将大段的粤方言对白引入文中。不难发现,粤方言人文其实并非当代原创,由文言文、白话文、粤方言口语混合而作

的“三及第”混杂文体早在晚清时期就已风靡于粤港地区,这类作品常见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广州报纸。早期的粤方言人文,还有着文学作品从口语载体转换为印刷文字载体的划时代意义,不仅促进了粤方言地域文学创作的雅俗合流,更重要的是为使用粤方言的读者们提供了阅读过程中的便利,并借由这种便捷,粤方言所带来的认同感再度得到强化。通过作家群体的不断坚持,“三及第”文体由原先的文言文、白话文、粤方言口语转换为现代汉语、粤方言口语和英语的组合方式,使得这种跨语言写作模式沿用至今,无疑成为了粤方言认同中一种常用的情感投射方式。依照言语共同体(社区)的概念——在一定地理范围内聚集的人群,彼此之间长期保持着互动的关系,并且具有一种心理认同,言语共同体(社区)成员一般还具有相同的生活方式,共同体内部往往还有一些公共的设施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建构也全面符合人群、互动、认同、生活方式及言语设施等共同体建构的五要素,而坚持将粤方言人文的书写行为,增加了“共同体”成员内部的互动,也加深了彼此的心理认同感,即从现实层面和理论层面分别印证了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建构的可行性。

对粤方言书写重要性的追认,再度显示了粤港澳地区文化基因的中华文化根性,将“语言”从文学的想象园地中推及到现实的认同中来。香港学者黄念欣在谈及粤方言书写的保护时也认为,香港始终拥有广东地区这一众“里应外合的兄弟”,这种观念不仅表达了深厚的同胞情怀,还真实反映出大湾区内部成员间已然形成了对言语共同体的认同,而且开始自觉地应用和维护共同体所拥有和使用的语言(方言),并将其认定为共同体的符号性标识。肯定粤方言的价值,并且重视相关的文学作品及其传播效用,亦有助于增强大湾区内外中华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

最后,粤方言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语言设施”,需要不断进行维护与完善,因此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构建的又一项重要环节,便是启动以粤方言为基本内容的相关著作、典籍的收集、整理和修葺等系列工程,中华文化基因也将在这类典籍和重要文献的修复与完善过程中得以继续传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构建,是将粤港澳大湾区丰富的内涵从文学、文化以及审美价值的维度向区位优势有机延展,并且通过根植于文学乃至文化中的中华文化基因来表达粤港澳大湾区共同体由内及外的整体性意义,加之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特质,被中华文化基因所标记的优秀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也将会通过这个特殊的空间向外传递,从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2019年底,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艾尤的新著《在欲望与审美之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女性小说的欲望书写》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可以说是大陆第一部以女性文学的欲望书写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它开拓了性别研究的新视域,指出了女性文学批评的新路向,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批评方式,是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之一。

笔者曾经也做过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课题,并出版了《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新论》。不过,《新论》的主旨在于梳理台湾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当代台湾各种文学体裁中的女性主义,对最能彰显女性主体意识、批判男权文化机制的女性欲望书写没有进行深入研究。艾尤的新作给予我很大的启示。

女性文学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分支,作为其重镇之一的台湾女性文学,自然也是中国女性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只有将台湾及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纳入中国女性文学这一研究视野,才能真正呈现中国女性文学的多元格局和发展全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新女性主义运动高涨,大批女作家以欲望书写的方式表达女性作为“人”的觉醒,并斩获各种文学大奖,成为当时台湾最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此著述正是以这一重要文学现象为观察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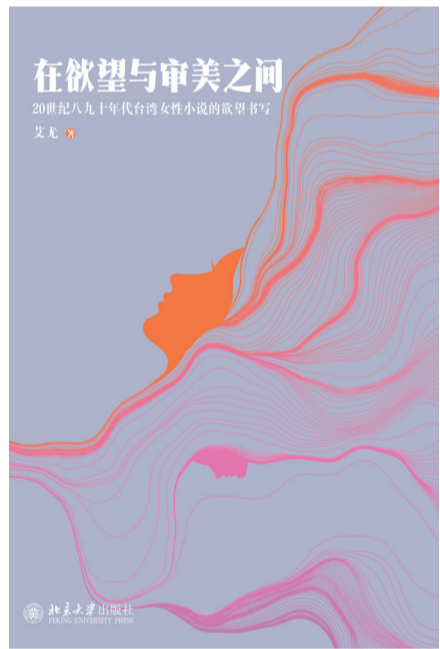
虽然台湾新女性主义小说研究在海峡两岸及海外已成为一门显学,大家从各种角度入手探讨,宏论迭出,精彩纷呈。同时,亦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欲望书写在中国女性文学中这一日益突出的重要文学现象。但是,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似乎被限制在某种既定的模式中。一直以来,学界对女性文学的研究都惯于从女性意识的内涵及理论出发,分析其在创作中的发展演变或表现特征,即便关注到了欲望书写,也惯于从“身体情欲”的角度出发予以探讨研究。

此著述的独特贡献是,突破了将女作家的欲望书写等同于“身体情欲”或“普泛欲望”的双重局限,指出了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路向。著者从性别理论出发,对相关概念进行梳理辨析,认为“欲望出现时女性诉求与男性诉求是有所区别的,带女性特征的这类诉求就是女性欲望,带男性特征的这类诉求就是男性欲望”,认为女作家的欲望书写具有独特内涵,提出并厘定了“女性欲望”这一概念。所谓“女性欲望”,就是指女性的自然欲望和社会欲望,是女人作为人的一种欲望,包含了女性自我对生存、安全、爱、自我实现等的一种本能以及文化的需要,是女性特有的不同于男性欲望的欲望”。并进一步提出,“只有女性意识觉醒了,女性才能意识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女性欲望,没有女性意识的觉醒,女人就不能意识到仅属于自己的、女性的、特有的欲望。如果说女性意识代表了女性人格的外在方面,那么深藏在女性意识背后的女性欲望则包含了种种力量,这些力量乃是女性

艾尤《在欲望与审美之间》

## 女性文学研究新话语的建构

□刘红林



行为背后的内驱力。”

著者选取了台湾女性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为阐释文本,从欲望追寻、欲望解构、欲望越界三个层面,整体把握女性欲望书写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美学建构。纵观全书,一方面从宏观上展开论述,探讨了女性欲望书写的历史沿革、社会语境、心理成因和文化传播;另一方面从微观切入分析,结合具体文本从身体文化、政治历史、主体建构等维度入手,梳理了台湾女性小说欲望书写从“私我”到“公我”再到“去我”的整体轨势。此书既以女性对自己身体欲望等“私我”境界的关注为基点,多层次地阐释女性在自觉的欲望追寻中,身体自主理念所具有的思想内涵和哲学意蕴;又关注女性在政治、历史等公共话语空间的“公我”形象,从性别政治角度阐释女性欲望书写如何解构男权话语关于政治、历史的寓言式言说,并建构起女性话语的象征体系;同时还聚焦女性的主体建构问题,对男权社会一直视为理所当然的性别差异与权力关系进行反省,并通过性别/欲望流动的多元“去我”书写策略,藉此反叛并颠覆了传统男性话语中心的欲望规范和性别话语体系。此书不仅勾勒出了一幅台湾女性小说欲望书写的生成、流变图景,还将女性文学的欲望书写研究从“私领域”拓展到了“公领域”。

这种写作策略,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交融,独到见解与生花妙笔相映,既脉络清晰又血肉丰满,时见智慧的闪光,没有概念分析的枯燥,引文堆砌的累赘。此著述通过细腻文本分析,展示了女性欲望书写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既赞扬其优良,也不避讳其局限性,而是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女性文学中的欲望书写现象。一方面,著者肯定了女性欲望书写中应该肯定的新事物、新质素;另一方面也对其缺失与不足给予实事求是地批评。例如著者认为,如果说朱天文的小说文本还具有美

学意义上的“颓废的美感”的话,那么在陈雪、洪凌等“酷儿派”的文本中,“颓废的美感”已经蜕变成生理意义上的“感官快感”,而这将导致女性欲望书写走向彻底迎合消费社会阅读趣味的“媚俗式”写作,并从审美的角度,仅建构在女性身体美学基础上的女性欲望书写,虽然为女性提供了一条回归自我、寻求生命本真的重要途径,但是若过于局限从生物性角度描述身体,无形中为男性营造了一个窥视女性欲望的空间,使女性书写成为男性欲望消费的对象。

一切有生命的文学论著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文本出发。女性欲望书写所涉及的女性批评和文化批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界面,此著述所含的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等,更是繁复难懂,想必著者一定是进行了非常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建构,才能够阐释清楚其所使用的学术名词、术语、概念,以及其所表述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但是这种理论的探讨并非此书的主题,而是著者笔下的一种工具,其主体则是她使用这种工具去分析代表作家李昂、平路、苏伟贞、朱天文、邱妙津、陈雪、洪凌等人的小说文本,通过对文本丝丝入扣的分析,由此产生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和独到发现,并形成了自己的女性欲望研究理论,这才是此著述的灵魂。最值得称道的是,此著述并不是简单地诸多女性欲望小说并而论之,进行作家作品亦或文学现象研究,而是从女性立场、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将文本研究上升到理论探索层面。

这部新著既对接了学术前沿的热点问题,具有创新价值,又体现了研究视野的丰富性,具有学术价值,同时还联结了女性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具有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当下女性文学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思考并探索女性文学及其研究发展的新动向,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女性文学研究其本质是关于“人”的研究,因此挖掘被掩盖的女性生命真相是其重要使命,这使得女性欲望书写成为女性文学及其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目前的中国女性文学著作中,女性欲望书写研究基本处于一种缺位的尴尬状态。另一方面,将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现今已成为学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尽管在当前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中,台湾女性文学的边缘化状态已有所改变,但大陆的相关研究成果却寥若晨星,因此对台湾女性文学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已迫在眉睫。此著述不仅填补了中国女性文学中女性欲望书写的研究,还有利于台湾女性文学突破目前的文学格局,融入到中国女性文学及中国当代文学中,从而把两岸及港澳文学的整合研究落到实处,这对于完善和推动中国女性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艾尤的研究有特色与深度,许多论述富有独到眼光和见识,显示了其在女性文学研究上的独特视域和造诣,不仅对内地的女性文学研究具有启发性意义,还建构了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话语。总之,《在欲望与审美之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女性小说的欲望书写》是一部有见地、有文采、有个性、有深度、有广度的力作。无论在文学、审美或文化层面,此著述都是研究台湾女性文学不可忽视的新成果。

## 书讯

## 张贵兴《猴杯》出版

近期,长篇小说《猴杯》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

张贵兴是马华文学重量级作家,他的文字密实华丽、浸淫漫漶,在港台及海外华文严肃文学创作者中,像他一样对于文本细节极致雕琢,又能驾驭宏大长篇故事的华文小说写作者,屈指可数。

《猴杯》是张贵兴继《赛莲之歌》《群象》两部小说之后,“雨林三部曲”(黄锦树语)的终章,也是他的生涯代表作。他以故乡风物为背景,以魔幻现实的笔调书写家族史,在极尽曲折的四代情仇之下,《猴杯》令人惊艳的,应是其浓墨重彩描绘的雨林意象、华丽文字将暴力、情欲投射在犀牛、蜥蜴、猴子、猪鬃草、丝绸树……种种野兽草木之中,超越历史与现实,打造出了一个狂野暴虐的传奇舞台。

《猴杯》的时空背景位于20世纪的马来西亚砂拉越,涉及华人离开故土、身处“异国”的离散情绪。但在张贵兴笔下,汉字的运用不拘于“中州正韵”的规范,而是将故乡的“贫乏”,幻化转写成奇诡魔幻的一片天地,与身处“中心”的大陆、台湾华文书写相对照,相映成趣,颇能开拓读者对于华文创作的眼界。(宋 闻)



林海雪原(水彩画) 徐宜超 作

华馨 唐建康书 HUA XIN